

建安文学编年史

刘知渐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卢季野

封面设计 李 巍

建安文学编年史

刘知渐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插页4 字数100千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00

书号: 10114·144

定价0.75元

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问题

——代序

中国史籍中的编年史极丰富。从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出现过《春秋左氏传》、《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实录》、《国榷》、《明通鉴》、《续通鉴》、《东华录》、《清实录》之类或繁或简的编年史，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文学方面的编年史，至今尚付阙如。这就使得文学通史或文学断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缺少坚实的历史依据。

近几十年，也有人试写片断的“系年”，但往往只是一个综合性的年谱考证，只能起到“索引”作用，而不是“编年”的“史”，仍不能为研究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依据。我们设想的文学编年史，不是若干作家年谱的综合，而是要象《资治通鉴》那样，把一群作家的写作活动及其重要作品逐年记述下来，它要涉及各个作家的写作活动和与写作有关的生活，但不记载烦琐的生活小事；它要评述作家的作品，但不须记载作家的每一篇作品；它要利用一切考证成果，使编年工作更加准确，不停滞于考证，也不把考证过程写入正文，而是

仿照《资治通鉴》后附《考异》的办法，把考证的根据写成注释，附在每年的正文后面。

· 献给读者的这本《建安文学编年史》，虽然只反映了建安这一短暂时期的文学活动，却是我们对文学编年史的一个尝试。在考证工作方面，凡前人或当代研究家已经做出成果的，我们都尽量利用，使编年工作尽可能接近真实。有些无法确定时间的重要作品，则尽可能写在接近正确的年代，或附在作家逝世的那一年。有些前人编错了年代的作品，也仔细地进行了新的考索。

例如，繁钦的《与魏文帝笺》和曹丕的《答繁钦书》的写作时间，陆侃如先生在他的《中古文学系年》里，根据《文选》李善注，定在建安十六年，这是错的。李善转引了《魏文帝集序》的下面几句话：

“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嚨，与笱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

陆侃如先生把“西征”二字误为曹丕《感离赋》序文中的“上西征，余居守”，从而误定为建安十六年。其实，曹操在建安十六年“西征”马超、韩遂，这时曹丕是“守邺”而非“守谯”，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有人又认为曹丕所说的“上西征，余守谯”，可能指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这也不符事实。我们从繁钦的《与魏文帝笺》中，看到开头的“正月八日壬寅”字样，查对《二十史朔闰表》，证明了建安十六年的正月八日不是壬寅，建安二十年的正月八日也不是壬寅，只有建安二十二年的正月八日，才是壬寅。再查一下《三国志》的《武帝纪》，建

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南征”孙权，十一月到达谯县，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驻扎居巢，曹丕这时在谯县留守。可见“守谯”是事实，而“西征”应是“南征”之误。因之，曹丕和繁钦书信往复，都是建安二十二年正月的事情。

又如曹丕的《与吴质书》和吴质《答魏太子笺》的写作时间，被陆侃如先生定于建安二十三年，则是以《三国志》裴注为根据的。在《三国志》卷二十一《吴质传》的裴注中所引《魏略》文字，有“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云云。表面看来有权威性，实际上也是错误的。考吴质的回信，载于《文选》卷四十，一开始就有“二月八日庚寅”字样。建安二十三年的二月八日不是庚寅，只有建安二十四年的二月八日才是庚寅，可见裴注所引《魏略》是错了的。陆侃如先生沿袭裴注之误，又把《吴质传》误为《陈思王传》，我们查了好久才弄清楚。

上述这个问题解决了，《典论》的写作年代也相应地可以解决。原来，《全三国文》从《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注所引《魏书》中，辑录了曹丕的《与王朗书》，在标题下添注“建安二十二年冬”字样，一般研究家多信其说。实则《魏书》所引《与王朗书》，只有“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章。疫病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数句。而下文“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则是魏《书》作者对曹丕行事的叙述，并非曹丕《与王朗书》中的文字。《全三国文》辑录者读错了原书语气，又从“疫病数起，士人凋落”八字，联想到徐干等人死于建安二十二年，便认为曹

丕此信也写于建安二十二年，甚至把写《典论》的事也拉扯在建安二十二年了。实则徐干等人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冬暮，直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曹丕才替他们编好遗集，写信告诉吴质。信中感到生命无常，自己应该早点从事著述，但并未说自己已经写了《典论》。不久，他写成了《典论》，连同自己的诗赋抄出来传阅，钟繇、王朗、卞兰等人都看到了。卞兰看了之后，还写过一篇《赞述太子赋》来称赞曹丕。这篇赋的序文中有“今相钟繇”字样，足见至迟应写于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钟繇“罢相”之前。由此可以推知，曹丕是在编好徐干诸人遗集之后才写《典论》的。《典论》中收有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甲午所作《剑铭》^①，可以证明《典论》写于同年二月至九月之间。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证方面的一点小小收获。

写文学编年史，是为了探索文学发展规律。从《建安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中，证明了文学高潮的到来，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前代文学遗产的积累达到了一定高度；二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对作家产生了强烈刺激；三是作家善于继承遗产，关心现实，情不自禁地反映了现实。这个规律，鲁迅先生早已说了一部分。他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②我们也认为建安文学是东汉中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建安文学以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从张衡开始创作的，乐府五言诗的时代也大概和张衡相先后，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大概也出在建安以前，如果没有这些遗产可供继承，建安文学中的五言诗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其次，鲁迅先生继承了刘勰对建安文学的看法，阐述了时代矛盾对作家的刺激作用。刘勰说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③。鲁迅解释说：“慷慨就因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②这就说明了建安文学是受时代刺激而产生的。三曹七子的优秀篇章，不是处处都证明了这一结论吗？同时，建安文学的感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鲁迅使用了钟嵘使用过的“悲凉”二字^④，也比较准确地表述了建安文学独特风格的一个方面。

再次，鲁迅先生说建安文学的发展，“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这比郭沫若同志把“建安文学的高潮”归功于曹操一人^⑤科学得多了。文学是现实生活通过作家头脑反映出来的，如果作家不能自觉地反映现实，如果没有众多的作家去反映现实，文学高潮是不会到来的。没有包括曹操在内的众多文士们自觉地反映现实，哪会有建安文学这个高潮呢？关于建安文学的发展并非曹操一人之功这点，曹植在二十五岁那年写信给杨修时，早已说得很清楚了。他说：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琰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赅之，顿八紘以掩之，今皆集斯土矣！（《与杨德祖书》）

可见这些文士在没有依附曹操之前，早就取得一定成就，哪里是曹操培养了他们呢？

我们可以从这本编年史里看到，建安七子中的孔融，是

建安元年才依附曹操的，到建安十三年就被杀了。孔融推荐给曹操的祢衡，大约是建安二年左右被逐的，他的名作《鹦鹉赋》是被逐以后才写的。陈琳是建安十年依附曹操的，在此以前，他早已“鹰扬河朔”了。他的《饮马长城窟》这篇名作，应该是他在何进被杀、避难冀州时观察现实的产物。自从他依附曹操以后，只能写点所谓“可愈头风”的应用文，再没有一篇接触现实的好作品了。徐干和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大约也在建安十年左右。徐干直到建安二十二年逝世，作品不多，所著《中论》不算文学，而其余作品基本上是“应教”之作。说明他和陈琳一样，依附曹操后，很少优秀作品。阮瑀依附曹操的时间，和陈琳、徐干差不多，只写了些应酬性的作品。应玚据说是被曹操强迫出山的，当然不会写出什么好作品。王粲和刘桢，一个有才气，一个有骨气，王粲传世之作，只有《七哀诗》和《登楼赋》写得好。但这些好作品都写在依附曹操之前。刘桢的《赠从弟》之二，是一首好诗，其所以好，在他不屈服于曹操的淫威。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是建安文学的两颗明珠。但蔡琰的文才是蔡邕培养出来的，而《孔雀东南飞》是东汉民间五言诗的结晶，都不应归功于曹操一人。

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一方面正如鲁迅所说，是为了避免他们同自己“捣乱”^②，另方面也是为了让让他们“陪太子读书”，以提高曹丕、曹植的写作能力。所以邺下文坛的写作活动，基本上是“出题作文”，而不是创作。曹丕、曹植要写《柳赋》，文士们也写《柳赋》；曹丕、曹植写《槐赋》，文士们

也写《槐赋》；曹丕、曹植写《大暑赋》，文士们也写《大暑赋》；曹丕、曹植写《出妇赋》，文士们也写《出妇赋》。翻遍建安文士的作品目录，这类同题目或同题材的“应教”之作占了大多数。“应教”相当于“奉命”，也就是“出题做文”。这样的文艺活动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曹丕、曹植的写作能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活动。曹植的写作水平在中年以后日渐成熟，超过了建安七子，实际上是建安七子培养了他。而曹操网罗建安七子，这对七子自身的写作并没有起过什么积极作用，相反地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此外，有人说建安文学是在安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曹操安定了北方，怎能说他对建安文学没有功劳呢？这也问得有理。从古及今，安定才能带来文化的繁荣，但文化的繁荣并不一定会出现文学的高潮。在古代，安定的环境下往往没有好作品，在盛极而衰或人心思治的时代，倒是容易出现好作品的。西汉极盛时代，文化很繁荣，但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徒的文学创作，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不能视为文学高潮。司马迁的《史记》有一定文学价值，是因他处在生活矛盾之中，不全是为了歌功颂德。建安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恰是盛极而衰、人心思治的产物；到了后期，便逐渐脱离现实，或者如鲁迅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了^②。这就是曹操对建安文学所起的消极作用。

通过对建安文学的编年，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发展的规律应该是：文学遗产的积累达到一定高度，使作者有可能充分地继承遗产，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现实生活的矛盾刺激了

作者，迫使作者表态，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愁苦之词易好”、“诗穷而后工”；最重要的是作者主动关心现实，愿意反映现实。如曹操的《薤露》、《蒿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都是作者关心现实、反映现实的产物。没有这三者的结合，是会产生优秀作品，更不会形成文学高潮的。

这本《建安文学编年史》，在评述作品时，特别注意它的文学性。一切应用文、议论文，都要看它有没有文采，如果缺乏文采，就一般地不加评述。有些应用文，虽然有点文采，如果内容毫无价值，也不加以评述。如象陈琳的檄文，虽然“可愈头风”，实质上毫无意义，也同样不加评述。其它一些著作，如徐干的《中论》、仲长统的《昌言》之类，是有学术价值的，但与文学关系不大，也不加以评述。我们希望这本编年史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史而不是“文章史”。

这本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曾建议一位青年同志试编，因极左思潮的干扰而中辍，我积累的资料也在十年动乱中全部散失。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族人刘晋笙同志因病退休，我又劝他试编。他用了几年功夫，写了一个介于“编年史”和“系年考”之间的东西，不象文学史。今年暑假，杨星映同志赴北京，到清华大学去把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的建安部分复制回来相互对勘，发现晋笙所写较为详尽，但有些关键问题尚未考索清楚。因此我又拿起笔来重写，现在算初步完成了。一本短短的文学编年史，经过好几个人的努力，曲曲折折地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

才和读者见面，但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如果这个路子走得通，也希望大家分段来写，再经过十年二十年，完整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一定可以出现。那时，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将会得到更大的改进。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建安文学，本书还收编了我的《重评郭沫若先生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其中有涉及建安文学的部分，并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是鲜述文同志所写，由我指导修改，观点和我一致，可以相互发明。《“建安风骨”新探》，是我对“建安风骨”的研究所得，都编在这本书的后面，以便参考。《建安诗文全目》作为附录，备查阅而已。

一九八四年七月于重庆沙坪坝

注：

① 《典论》中收有《剑铭》，铭文有“建安廿有四载二月甲午”字样（《北堂书钞》引文），可证《典论》作于建安二十四年。但黄初年间续有增补，则是另一问题了。

②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③ 《文心雕龙·时序》篇。

④ 钟嵘《诗品》。

⑤ 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目 录

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问题(代序)	1
------------------------	---

建安文学编年史(前编)	1
-------------------	---

建安文学编年史(正编)	9
-------------------	---

建安文学编年史(后编)	70
-------------------	----

附 录

重评郭沫若先生的《替曹操翻案》	79
-----------------------	----

从曹操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	95
--------------------	----

“建安风骨”新探	112
----------------	-----

建安作家诗文全目	129
----------------	-----

建安文学编年史

前 编

建安，是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起于公元一九六年，迄于公元二二〇年，共计二十五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比较发达，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高峰，不是偶然出现的。研究建安文学，应当追述一下建安元年以前若干时期的文学现象，才能说明建安文学的“前因”。

建安前数十年

1. 乐府五言诗大都出现于东汉中期以后，其中《陌上桑》一篇，写采桑女子罗敷受到五马太守的调戏，“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①。它艺术水平较高，标志着乐府民歌中的五言叙事诗已经比较成熟了。其它如《艳歌何尝行》、《艳歌行》、《白头行》，各自抒写了人生的某些悲哀，标志着乐府民歌中也出现了较好的五言抒情诗。

2. 留下姓名的乐府歌词作者辛延年，写了一首《羽林郎》，一般认为是讽刺执金吾窦景纵容“奴客”抢掠民间妇女而

遭到抵制的作品。其故事应出于窦宪当权时期，而作品应该稍后一点。词中写道：

昔有霍家奴
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
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
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
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
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
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
两鬟千万余
不意金吾子
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煜
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
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
金盘烩鲤鱼
贻我青铜镜
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

何论轻贱躯
男儿爱后妇
女子重前夫
多谢金吾子
私爱徒区区

这是一篇小型叙事诗，篇幅较乐府歌词《陌上桑》略短一些，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可以和《陌上桑》媲美。如果说《陌上桑》中的罗敷只不过“盛夸其夫”来婉拒五马太守的调戏，则《羽林郎》中的胡姬，便义正词严地撕断被金吾子拉扯过的“红罗裾”，反映了下层妇女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风貌，更为可贵一些^②。

3. 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也是建安前数十年的作品，它标志着五言诗已经脱离乐府歌词而独立了，其风格多数“悲凉”，无疑是产生于东汉的“衰世”。例如：

驱车上东门
遥望北郭墓
白杨何萧萧
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
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
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
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迭
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③

此诗一种颓废心情，跃然纸上，正是东汉“衰世”的时代特色。其他一些《古诗》及伪托的李陵、苏武赠答诗，都应属于这一时期的无名氏所作，其风格也是以“悲凉”为主的。

建安前五十年

4. 永和四年(一三九)，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逝世。张衡，字平子，南阳人。写过大型的《二京赋》和短小的《归田赋》，也写过五言诗。他的名作《四愁诗》，标志着七言诗的出现。其第一首是：

我所思兮在泰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
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
何为怀忧心烦劳

就形式上看，这是从骚体过渡到七言的作品，全诗四首，合为一组，称为《四愁》，后三首和第一首基本相同，只是换了一些词汇而已，和《三百篇》中那些“一唱三叹”的做法极为相近。建安作家曹丕的《燕歌行》，一向被称为七言之祖，实则全从《四愁》学来，《四愁》每首七句，是单数，《燕歌行》也是单数，似乎有意在学《四愁》吧④！

建安前四十五年(一五一)

5. 建安作家之一的邯郸淳，这年撰《孝女曹娥碑》，碑文典则，文学意味较少，与当时流行的文风一致，即在建安时期，这种文风也未被摈弃。此碑向为书法界所重视，邯郸淳活到黄初初年已过九十，此文中有元嘉元年字样，他当时的年龄不过十七八岁，应当是享寿最长的建安作家之一了。可惜他的文章流传较少，好作品更少⑤。

建安前四十年左右

6. 桓帝统治时期，官吏贪暴，河南李盛仲和任巴郡太守尤突出。于是民间出现了讽刺暴政的五言诗。诗中写道：

狗吠何喧喧
有吏来在门
披衣出门应
府记欲得钱